

刘芳亮 著

日本江户汉诗
对明代诗歌的接受研究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博士文库资助项目

山东大学出版社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博士文库资助项目

日本江户汉诗对明代诗歌的 接受研究

刘芳亮 著



山东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日本江户汉诗对明代诗歌的接受研究/刘芳亮著.
—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3.4
ISBN 978-7-5607-4767-5

I. ①日… II. ①刘… III. ①汉语 - 诗歌 - 诗歌研究 - 日本 - 江户时代 ②古典诗歌 - 诗歌研究 - 中国 - 明代 IV. ①I 313.072
② I 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744733 号

责任策划:张晓林

责任编辑:董付兰

封面设计:牛 钧

出版发行:山东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山东省济南市山大南路 20 号

邮 编 250100

电 话 市场部(0531)88364466

经 销:山东省新华书店

印 刷:山东泰安金彩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规 格: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9.25 印张 246 千字

版 次:2013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201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26.00 元

版权所有,盗印必究

凡购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本社营销部负责调换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节 本书写作缘起	(1)
第二节 研究现状综述	(7)
第三节 研究方法	(13)
 第一章 明代诗歌、江户汉诗概观以及连接两者的汉籍输入	(15)
第一节 明代诗歌述略	(15)
第二节 江户汉诗概观	(22)
一、江户汉诗的流变与特征	(22)
二、江户汉诗繁盛的原因	(28)
第三节 连接明代诗歌与江户汉诗的津梁：汉籍输入	(32)
 第二章 明七子派在江户诗坛的流播与接受	(39)
第一节 江户前期明七子派的流播与接受	(39)
第二节 萱园派与明七子	(54)
一、荻生徂徕对李攀龙、王世贞的接受	(54)
二、服部南郭的虚拟世界	(75)
三、萱园派拟古诗文举隅	(84)



四、萱园派引发的明代诗文出版热潮	(101)
五、《唐诗选》的流行	(108)
第三节 追摹明七子派风潮的终焉与萱园派的意义	(130)
第三章 公安派在江户诗坛的流播与接受	(137)
第一节 萱园派以前公安派的流播与接受	(137)
第二节 山本北山对性灵说的标举与江户诗坛的 清新性灵派	(155)
一、山本北山与公安派性灵说	(155)
二、江湖诗社的性灵诗论	(187)
三、宋诗的流行和宋诗风的展开	(194)
四、清新性灵派诗歌举隅	(207)
第三节 公安派性灵说的整合与消退	(215)
结语	(223)
附录	(229)
附录一 江户时代中日历史纪年对照表	(229)
附录二 萱园派系谱图	(241)
附录三 山本北山门略系图	(245)
附录四 书中引文对应之日语原文	(251)
参考文献	(268)
后记	(287)

绪 论

第一节 本书写作缘起

日本江户时期儒学者江村北海在《日本诗史》卷4中写道：

夫诗，汉土声也。我邦人不学诗则已，苟学之也，不能不承顺汉土也。而诗体每随气运递迁，所谓《三百篇》、汉魏六朝、唐宋元明，自今观之，秩然相别，而当时作者则不知其然而然者，其运使之非耶？我邦与汉土相距万里，划以大海，是以气运每衰于彼而后盛于此者，亦势所不免。其后于彼，大抵二百年。胡知其然？《怀风藻》、《凌云》二集所收五言四韵，世以为律诗，非也。其诗对偶虽备，声律未谐，是古言渐变为近体，齐、梁、陈、隋渐多其作。我邦承其气运者，稽其年代，文武天皇大宝元年，为唐中宗嗣圣十四年，上距梁武帝天监元年凡二百年。弘仁、天长仿佛初唐，天历、应和崇尚元、白，并龟免乎二百年之后。五山诗学之盛，当明中世，在彼则李何、王李唱复古于前后，在此则南宋、北元，专传播于一时，其距宋、元之际亦二百年矣。我元禄距明嘉靖亦复二百年，则七子诗当行于我邦，气运已符。故有先于徂徕已称扬七子者。《活所备忘录》曰：“李沧溟著《唐诗选》甚契余意，学诗者舍之何适？”又曰：“谢茂秦《洞庭湖》，徐子与、吴明卿《岳阳楼》作，气象雄壮，与绝景相敌，殆可追步少陵。”永积善斋



《脍余杂录》亦论及七子。而时运未熟，故唱之而无和者。迄徂徕时，其机已熟，白石、沧浪、蜕岩、南海大抵与徂徕同时，并非贾萱园之余勇者，而其诗虽曰宗唐，亦唯明诗声格。故云气运使之也。繇是论之，则其或继今者，虽数百年可知也。^①

此段引文稍长，这是江村北海在论及大抵同时代的荻生徂徕一派宗尚明嘉隆七子时所作出的解释。姑且不论其“气运”说是否合理，但他对日本汉诗自古以来学习中国诗歌的发展变化趋势把握得还是颇为准确的。江村所指出的“二百年”的滞后期其实并不准确，显然是为配合其“气运”说而大略言之，如果换个角度看，这所谓的“二百年”的滞后期正是中国诗歌在日本传播、接受、消化吸收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在江户时代后期大大缩短，绝非二百年之久了。

江村北海开篇即说日本人学诗“不能不承顺汉土”，事实也的确如此。日本汉诗本就是日本人使用汉语创作的诗歌，虽作于彼土，然必须时时承学于中国，否则将无法发展下去，这是客观的规律。正因此故，日本文学自其发轫之初便积极学习中国文学。从时代顺序看，最早的奈良朝时期热衷于学习《文选》诗和初唐诗，其后平安朝时期则效习中唐白居易诗歌，至镰仓、室町时代又汲取宋、元诗歌，到了江户时代则广泛学习明、清诗歌。每一个时代各有所宗，各个时代都有特定的诗风，而此诗风又每每取决于学习中国哪个时代、哪个流派的诗歌。若就江户时代的汉诗而论，其发展递迁深受其所研习、追摹的明代诗歌特别是诗论的影响，在诗风上发生的两次重大转变皆源于

① 清水茂ほか校注『日本詩史・五山堂詩話』(新日本古典文学大系第65)，岩波書店1991年，508頁。有趣的是，在李氏朝鲜亦有中国文学东传时差之说。李德懋曰：“大抵东国文教较中国每退计数百年后始少进。东国始初之所嗜，即中国衰晚之所厌也，如岱峰观日，鸡初鸣，日轮已腾跃，而下界之人尚在梦中。又如峨嵋山雪，五月始消。”(《青庄馆全书·孤云论儒释》，《韩国文集丛刊》第259册，民族文化推进会2000年版，第245页)又洪吉周语云：“近世东人文词之号为中国体者，即亦中国数百年前所尚耳。今日之中国，已弃之如垢秽矣。”(洪吉周：《沉瀣丙函·丛秘记》，转引自李立信《杜诗流传韩国考》，台北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52页)



对明代诗歌及其诗论的接受。其中一次转变正是江村北海当时所指出的以荻生徂徕为首的萱园派称扬明七子，而诗坛“唯明诗声格”。但是，北海在感叹诗坛效明七子而宗唐的同时也敏锐地预见到这股诗风必然会被其他潮流取代，因为他看到了“当今京摄才髦所作，往往出于此途（笔者按：指专宗晚唐，颇似于元季明初）”^①的征候。后来的情况确实如他预测的那般，萱园派的势力遭到排斥，而另一种诗风——宗宋、元代之而兴，这又是江户汉诗发展的一次重大转折。从表面上看似乎无非是诗歌宗唐、宗宋之兴代交替而已，但其实这两种诗风均是在中国明代诗歌理论的直接影响下而酿成的，即：以徂徕为首的萱园派标举明七子，高唱复古，模拟盛唐诗，致使拟唐诗、拟明诗盛行一时；而后，山本北山及江湖诗社又借公安派的“性灵说”从理论上强烈批驳萱园派，由此引发了宋诗风的流行。或者说习唐、效宋这两种先后盛行的群体性诗歌创作背后的共同特征是它们都是在由中国引入的诗论的明确指导下进行的活动，绝非无关诗坛大势的个别诗人的模仿经历，而这两股诗风可以认为是江户诗坛最显著、最主要的两大创作潮流。不过，以上看法毕竟是笔者个人的观点，只引北海之语佐证说服力似有不足。江户时代的文人、学者（有些甚至是这些诗风的实际体验者）等又是如何观察江户汉诗变迁的呢？我们还需要从他们的言论中获得更为可靠有力的检证。

元享年间伪诗之徒流毒一世，及先生（笔者按：指山本北山）出，首唱中郎之清新，排击李王之腐调，盖所谓大承气汤也。近日诗风大改，先生之功居多。^②

我邦享保以还伪唐诗行，以高华雄浑为宗，诗道一变，当时作者蔚然称盛。然学之者浸成格套，浮响虚声，无复真情，模拟剽窃、千篇一律、陈腐烂熟之弊极焉，而诗道大病矣。天明已来，

^① 清水茂ほか校注『日本詩史・五山堂詩話』(新日本古典文学大系第65),509頁。

^② 大窪詩伝『詩聖堂詩話』,池田四郎次郎編『日本詩話叢書』(第3卷),龍吟社1997年,431~432頁。



学者矫之以宋，伪宋诗行，以清新拔峭为宗，诗道又一变，一时作者焕然辈出。然学之者稍入俚易，纤弱轻佻，无复气骨，师心冲口，无复典故，气象卑靡、风格萎落、浅薄空疏之弊极焉，而诗道又大病矣。^①

曩者享保、元文之际，世方尚嘉隆七子诗体也，一时轻佻浮诞辈才子自命，倨傲尊大，党同伐异，蛇蟠蚓结，牢不可解。辄则扬言曰，秦汉以后，宋元无诗。斯言一出，同气相应，鱼烂河决，莫之能禁，遂泛滥天下。而其所由，实萱园诸子构煽鼓击，以成斯风也。方兹时，宋元名家集卖买以权衡，称之轻重，一准故纸价。尔来五六十年，诗体大变，人情顿渝，嘉隆与宋元爱恶易地，宛似夫田窦相倾之状。于是乎，嘉隆及萱园诸子集又稍归故纸堆中，往往供纨绔酱瓿之用。^②

享保诸先生徂徕、南郭之徒唱明，诗风大兴，然至近世，好奇特议论，渐陷宋人陋风。^③

享、元诗人喜明诗，亦知贵唐诗；今日诗人喜宋诗，或至废唐诗。^④

自享保、正德诸大家辈出，大抵本嘉万七子而模拟唐贤，大而未化，葛蠹庵一变之，六如师二变之，而江湖社诸子更相标榜，海内喟然，非复旧习。^⑤

元、享以来，明诗盛行，宋诗则弃如粪土耳。近日专主宋诗，

① 太田錦城「刻誠齋詩序」，長沢規矩也『和刻本漢詩集成』（宋詩篇第5輯），汲古書院1976年，330頁。

② 六如上人「增續陸放翁詩選序」，長沢規矩也『和刻本漢詩集成』（宋詩篇第6輯），177頁。

③ 源孝衡『詩學還丹』卷上，池田四郎次郎編『日本詩話叢書』（第2卷），龍吟社1997年，167頁。原文为日语，系笔者自译，以下凡标明“原日语”者皆同此。

④ 葛西因是「宋百家絕句序」，卷菱湖編『宋百家絕句』，江戸万笈堂ほか文化十年刊本，3頁。

⑤ 賴山陽「茶山先生行狀」，富士川英郎ほか『詩集日本漢詩』（第9卷），汲古書院1985年，300頁。



黃口耳皆趋彼，几令明人无处生活。^①

享保以下为诗者，必主唐明，享和以来为诗者，皆娴宋元。^②

至元禄、享保，作者林立，就中木门、萱园之徒最盛、人人开天而不舍，羞用唐以后之事。虽持论过高，用典太隘，均不免模拟短钉之病，动招后人刺讥，然其有功于艺苑亦不可废也。总而言之，建露以后之诗，尚沿五山缁徒之陋习，一变于享保，又一变于宽政，又一变于近今。要之，风气之所趋，岂专人力乎哉！^③

及元禄、享保而明风大行，其宏丽肥美有可观者，而诗始盛矣。其流弊，模拟缘饰，神骨消亡，而诗乃衰矣。及天明宽政间，稍觉其可厌而未得其人（旁注：有二三名手起倡宋元一时，轻俊子弟争仿之沾），乃竞新争奇，人人自喜，诗论密而艺疏，说高而语卑，萎靡不振，以至于今日焉。^④

正享多大家，森森列鼓旗。优游两汉域，出入三唐篱。格调务摹仿，性灵却污蔽。里翬自谓美，本非倾国姿。天明又一变，赵宋奉为师。风尘拂陈语，花草抽新思。^⑤

正德、享保之诗有格调而无性情，天明以后之诗，主性情而不知有格调……享保学明，天明学宋。^⑥

享保间，萱园之徒唱李、王，而京摄乃盛于安永、天明，其相距殆三十年矣。当此之时，江户之文士稍稍有奉晚唐、宋元者，

① 津阪東陽『夜航詩話』卷6，池田四郎次郎編『日本詩話叢書』（第2卷），531～532頁。

② 赤沢一堂『詩律』「詩調」，池田四郎次郎編『日本詩話叢書』（第4卷），龍吟社1997年，456頁。

③ 友野霞舟「熙朝詩薈序」，池田四郎次郎編『日本詩話叢書』（第8卷），龍吟社1997年，306頁。

④ 篠崎小竹「山陽詩鈔序」，賴山陽『山陽詩鈔』，大阪石川嘉助1897年，1頁。

⑤ 広瀬淡窓「論詩贈小関長卿中島子玉」，富士川英郎ほか『詩集日本漢詩』（第11卷），汲古書院1987年，257頁。

⑥ 広瀬淡窓『淡窓詩話』，中村幸彦校注『近世文学論集』（日本古典文学大系第94），岩波書店1969年，364頁。原日语。



迨至文政，其风大行。于是，集当世诸家之诗，刻以传四方者，家有其书，不啻汗牛充栋，亦可见一时之好尚矣。^①

其始犹沿袭宋季之派，其后物徂徕出，提倡古学，慨然以复古为教，遂使家有沧溟之集，人抱弇洲之书，辞藻高翔，风骨严重，几与有明七子并辔齐驱。传之既久，而梁星岩、大洼天民诸君出，则又变而抒写性灵，流连景物，不屑以摹拟为工，而清新俊逸，各擅所长，殊使人读之有愈唱愈高之叹。^②

以上诸家言论充分表明了近世的文化人几乎一致认识到受明七子复古论调影响而盛行的唐明诗风和其后受性灵说刺激而兴起的宋元诗风这两大潮流构成了江户汉诗发展的主线，这是毫无疑义的。在某种程度上，将江户汉诗的发展史定义为对明七子复古论和公安派性灵说的接受史似乎亦不为过。故此，本书拟以明七子派和公安派文学及其主张在江户诗坛的流传与接受为基轴探讨江户汉诗对中国明代诗歌的接受情况，揭示其在这两派文学影响下的变迁。需要事先说明的是，江户诗坛接受明诗更多地看重后者的诗学主张，对于明诗的具体作品虽亦有评点、赏析乃至模仿，但是在这方面的摄取其实并不显著。

在日本国内，由于明治特别是大正以来对汉文学一直采取贬抑态度，对它的研究始终得不到重视，战后这种局面才略有改善，汉文学传统得到重新评价。尽管如此，汉文学研究依然不可与和文学研究同日而语，日本国内专门从事汉文学研究的人很少，即便是在汉文学研究领域颇有成就的学者大多也是和、汉文学研究兼攻。而从汉文学研究本身来看，又多偏重于平安朝时期^③，对五山汉文学和江户汉文学都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与这两个时代所遗存的丰富作品资

① 藤森弘庵「近世名家詩鈔序」，富士川英郎ほか『詞華集日本漢詩』（第7卷），汲古書院1983年，481～482頁。

② 俞樾撰、佐野正巳編『東瀛詩選』「序」，汲古書院1981年，4頁。

③ 例如，对如何接受《文选》和白诗的研究相当多。



料是极不相称的。^① 关于此种情况,我们从享誉学界的岩波书店《日本古典文学大系》便可窥其一斑。岩波书店 20 世纪 50 ~ 60 年代出版的 100 卷本收汉文学方面的著作至多 8 卷^②;而 90 年代重新策划出版的《新日本古典文学大系》则加大了汉文学的比重,收汉文学方面著作 13 卷,尤其是还单独收录了江户时代的汉文学作品 3 卷,而不是像旧版那样将五山文学与江户汉诗合为一册。不过,即便如此,汉文学作品的比例也只占整套丛书的 1/10 强,由是可见汉文学研究在当今仍旧受轻视的状况,因而加强汉文学研究便显得迫切而重要了。如果单就江户时代的汉文学而论,除了其原始资料的丰富性这一大特点外,该时期相当频繁的中日商贸往来导致中国明清时期的书籍大量流入日本,日本国内的知识界通过书籍能够掌握中国文坛情况,因此对稍早的明诗和同时代的清诗均有全面且深入的了解,并据以对本国汉诗的趋向作出调整以紧随中国的步调。这样一来,江户时代的日本汉诗与中国诗歌之间有着较以往更为广泛、密切的关联,其中有非常多的空白课题值得展开研究。总之,正是由于和、汉文学研究的严重失衡,而江户汉诗如此浩瀚,其与中国诗歌的联系又这般紧密、广泛等情况存在,因此本书通过探讨江户汉诗对中国明代诗歌的接受以揭示江户汉诗的发展或许不失为一种有意义的尝试吧。

第二节 研究现状综述

以笔者所知,不论国内抑或国外专门从江户汉诗接受明代诗歌这一课题入手的研究目前尚无,但涉及此论题的研究还是有不少。

^① 五山汉文学资料有上村观光编《五山文学全集》(五册)和玉村竹二编《五山文学新集》(八册),而江户汉文学资料更是多得难以统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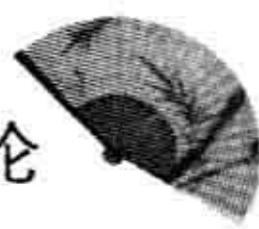
^② 这里存在一个判定标准问题。例如对《风土记》这种变体汉文成分较多的作品,笔者不视其为汉文学著作;而《近世文学论集》的前半部分收关于和文学理论的作品,后半部分则收评论汉诗的诗话类作品,笔者仍将其算作汉文学著作一卷。



国内的研究方面,总体上看比较零散而且不够深入,主要如下:

王晓平《近代中日文学交流史稿》(1987)中“袁宏道的性灵说和山本北山的清新诗论”一章较为详细地论及了山本北山《作诗志穀》和袁宏道之间的关系,不过对《作诗志穀》的解读似乎还不够细致全面。衷尔鉢《公安派文学在日本的传播和影响》(1990)一文所论实为陈元贊在日本传播袁宏道的文学,这仅是日本接受公安派文学的一个很小的侧面。林章新《袁宏道对日本诗文学的影响》(1993)主要论述了僧元政对袁宏道诗歌的接受,内容与衷文大体相同,又兼及山本北山援引袁宏道之说反徂徕一事。蒋洪生硕士论文《日本萱园诗学·萱园诗风研究——江户时代中日文化与文学之关系》(1997)专论萱园派诗学及其兴衰,援引资料比较广泛,然而对萱园派创作拟古文、拟唐诗缘由的分析窃以为仍不够深入,而且文中创见似乎不多,又偶有一些论据不足的附会之论。同氏《徂徕学派の詩文論とその展開》(2011)及大致与之对应的中文版《儒学诗教与诗歌典范的选取:日本江户时代中期徂徕派诗学略论》(2012)认为徂徕诗学的本质是因格而摹情,即在追求诗歌情感表达的同时,也希冀这种表达受格调的规范和限制,合乎诗教。不过,其中存在的问题是徂徕的诗学固然是徂徕派诗学理论的核心,但并不能与整个徂徕派的主张画等号,事实上徂徕派内部存在着一定分歧,如太宰春台后期的观点就与荻生徂徕有较大差异,此外徂徕殁后的文学一脉也已完全偏离了徂徕倡导文学创作的本意——体悟先王之道。张伯伟《诗词曲志》(1998)第八章第二节《日本汉诗》^①简明扼要地梳理了江户汉诗的流变,言及江户诗风的两次重大转变;其《清代诗话东传传略论稿》(2007)一书以考察清代诗话流传到日、韩的途径和过程为线索来研究清代诗话在异国的流传和接受状况,颇多独到之见。是书虽亦涉及日本诗坛对明诗的看法,但是毕竟是以清代诗话为考察对象,

^① 后又收入同氏著《东亚汉籍研究论集》(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7年版)中,该书另有大陆版《域外汉籍研究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故不深入。谭雯《明代复古与反复古文学思潮对日本诗话的影响》(2000)及其硕士论文《明代诗话与日本诗话比较研究》(2002),以《日本诗话丛书》为出发点考察丛书中有关诗歌复古与反复古论争在日本的延伸以及日本诗话在一些论题上对中国诗话的继承和发展问题,虽不乏对文本的细致解读,但仅据《日本诗话丛书》这一种资料,视野自然有限,方法又不免较为单一;其博士论文《日本诗话及其对中国诗话的继承与发展》(2005)和以博士论文为基础出版的专著《日本诗话的中国情结》(2007)分诗史论、格法论、本质论、批评论、作家作品论等五个部分论述了日本诗话在这些问题上的看法和论争。祁晓明《江户时期的日本诗话》(2009)一书主要利用了池田胤编《日本诗话丛书》和松下忠著《江户时代的诗风诗论》等书探讨了日本诗话(主要是江户时代的诗话)在诗歌本质、诗韵诗律、诗歌创作、诗歌批评和诗歌鉴赏等方面见解,并与中国诗话对同一问题的看法进行对比,其研究方法与谭雯《日本诗话的中国情结》一书很接近,而总体上较为深入细致。蔡毅《日本汉诗论稿》(2007)一书主要从中日文学交流和影响角度来探讨日本汉诗,对本论题略有涉及。陈广宏《明代文学东传与江户汉诗的唐宋之争》(2010)一文以江户汉诗坛的唐、宋之争为案例来观照中、日两国文学面对大体共享的文化、文学资源时表现出的共趋态势和本民族独特面貌,但是该文所依据文献十分有限,而且引文标注不够规范,影响了其价值。其他如张寅彭译《关于日本的诗话》(1990),严绍璗、王晓平《中国文学在日本》(1990),肖瑞峰《日本汉诗发展史》(1992),吴廷璆主编《日本史》(1994),王晓平《江户折衷诗派的论诗诗》(1995,后又收入同氏著《亚洲汉文学》),高文汉《中日古代文学比较研究》(1999),张伯伟《选本与域外汉文学》(2002),郝润华《陆游诗歌与日本江户文学——以市河宽斋为中心考察》(2004),叶渭渠、唐月梅《日本文学史·近古卷》(2004),蔡镇楚《比较诗话学》(2006),吴雨平《儒学的日本化与江户汉诗》(2007),陈福康《日本汉文学史》(2011)等论著皆稍略提及本书研究内容。



在日本,由于得天独厚的优势,这方面的研究自然比中国更为深入细致。其中首推松下忠的宏著《江戸時代の詩風詩論》(1982),该书对江户诗坛是如何接受中国明清诗坛上的格调说、性灵说、神韵说作了细致的研究,其研究方法主要是从作家的诗论中找出以上三说的痕迹,所取资料极为丰富。但是缺点也很明显:因结构宏大而又篇幅所限,在许多问题上尚未充分展开;研究方法比较单一,若作家诗论中存在与某说相似之处则认定受此说影响,故牵强附会之处时而有之;没有联系相关中国典籍在日本的传播状况,故对江户诗坛如何接受中国诗论的背景几乎未曾言及,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说服力;对江户诗坛接受中国诗论的心理、原因和机制更是极少言之。岩桥遵成《徂徠研究》(1934/1982)是一部较早对荻生徂徠进行全面研究的著作,实有筚路蓝缕之功,其中大略述及徂徠与文学相关的著作及其诗文观。今中宽司《徂徠学の基礎的研究》(1966)及其增删版《徂徠学の史的研究》(1992)梳理了荻生徂徠一生的学问著述活动,并论及古文辞派的诗学以及萱园的结社活动,颇可参考,然而对于徂徠诗文观的阐述仍有未及周全之处。日野龙夫围绕萱园派的文学展开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研究,其代表作如《文学史上の徂徠学・反徂徠学》(1975)、《徂徠学派の役割》(1986)、《服部南郭の想像力》(1966)、《演技の文学—古文辞派について—》(1967)^①等深入探究了江户诗坛萱园派的创作拟古诗文的心理背景,但其不足窃以为在于萱园派的拟古创作心态尚可联系荻生徂徠的语言和经世思想进一步挖掘,而且日野氏很少阐述萱园派的具体诗论主张,亦缺乏比较文学的研究视角。吉川幸次郎的《徂徠学案》(1973)从语言思想、文学思想、哲学思想三个方面对荻生徂徠一生的学术活动进行了深入考察,其特点是将考察置于徂徠的经世学、哲学背景中,多能联系徂徠的境遇,而在探讨其文学思想时紧扣《徂徠集》等原始文本来进行申

^① 这些论文后来均收入《日野龍夫著作集》(第1卷,ペリカン社2005年),但内容有所删改,标题亦作了改变。



发,指出了徂徕对李攀龙、王世贞的理解,时发卓见,只是由于“学案”本身的性质所限,吉川的研究重点在于徂徕学问的发展历程,并没有太多从比较文学的角度出发来讨论。若水俊《徂徕とその門人の研究》(1993)一书探讨了徂徕透过《诗经》所表达的文学观念,门下安藤东野、平野金华等弟子的文学活动以及徂徕学向地方的渗透。片冈龙《十七世紀の学術思潮と荻生徂徕》(2001)一文以17世纪东亚学术思潮为背景分析了荻生徂徕接受明代古文辞学的思想动机,即对蔓延于当时东亚学术界内的相对主义思考方式进行扬弃。蓝弘岳《徳川前期における明代古文辞派の受容と荻生徂徕の「古文辞学」—李・王関係著作の将来と荻生徂徕の詩文論の展開—》(2008)深入分析了李攀龙、王世贞著作在江户前期传入、流播日本的情况以及荻生徂徕以批判宋代诗文为中心的诗文观。揖斐高《擬古論—徂徕・春台・南郭における摸擬と变化—》(2009)阐述了荻生徂徕、太宰春台、服部南郭师徒三人对待作为诗文创作方法的“模拟”的态度差异。高山大树《『滄溟先生尺牘』の時代—古文辞派と漢文書簡—》(2011)一文探讨了在古文辞派鼎盛时期《沧溟先生尺牍》在江户文坛的盛行及其原因,揭示了李攀龙、王世贞对江户文坛影响的一个侧面。白石真子《太宰春臺の詩文論:徂徕学の継承と転回》(2012)细致论述了徂徕高徒太宰春台是如何实践并逐渐偏离徂徕诗文论的,认为春台晚年对古文辞学的批判实质上是彻底继承古文辞学方法和思想后的一种回转。对于江户诗坛的清新性灵派,揖斐高则有较深入的研究,他在这方面的代表性论文如《性靈論:江戸漢詩における古典主義の克服》(1993)将性灵说概括为三个要点,并与山本北山《作诗志穀》进行了对比,指出北山真正承袭了性灵说,《作诗志穀》一书是江户诗风转换的关键标志。文章结论虽然令人信服,但忽略了北山在其他著述中对性灵说的阐发(如题写的序跋),而且并未发现《作诗志穀》和袁宏道的诗论文章在文本上的互文关系,再者山本北山积极接受袁宏道的文学观似乎不像文中所论那般单纯,更有牵涉北山文艺观的深层因素。揖斐高的其他论著



如《漢詩の隆盛》(1996)等基本继承了前文的观点。中村幸彦的《風雅論の文学觀》(1982)和《清新論の文学觀》(1982)对江户汉诗与明七子复古派、公安派的关系作了一番概论性的论述,但均没有深入展开。日野龙夫《近世後期漢詩史と山本北山》(1965)认为以山本北山为代表的清新性灵派诗论,在不违背町人价值观、不破坏其生活秩序的前提下促进了汉诗的普及化和市民化,为新时代的文学提供了营养,但北山标举袁宏道性灵说本身并非出于文学意识的自觉,而是其经世济民政治抱负在文学上的对应而已。高桥博巳《六如の生涯と詩》(1987)以从古文辞派诗风的蜕变为主线详细论述了宋诗风的先驱六如上人的诗歌生涯。真壁仁《徳川儒学思想における明清交替:江戸儒学界における正統の転位とその変遷》(2012)一文指出江户诗坛从古文辞派向反古文辞派蜕变的背后反映的正是江户儒学界由明代学术接受向清代学术接受的转变。此外,汉文学通史性的一系列著作,如户田浩晓《日本漢文学通史》(1957)、神田喜一郎《日本の漢文学史》(1959)、绪方惟精《日本漢文学史講義》(1961)、市川本太郎《日本漢文学史概説》(1969)、猪口笃志《日本漢文学史》(1984)、芳贺矢一《日本漢文学史編》(1987)、山岸德平《近世日本漢文学史》(1987)、富士川英郎《江戸後期の詩人たち》(1973);诗歌选集(附有解说和评论),如日野龙夫等编纂的《江戸詩人選集》(1990~1993)、富士川英郎等编《日本漢詩人選集》(1998~2010)等等著作对本书论题皆有一定涉及。其他稍略言及本书论题的研究成果尚有很多,在此不能一一列出。

总之,不论是国研究还是日本国内研究,虽取得了不少成果,但系统、全面地探讨江户汉诗对明代诗歌的接受的专门研究尚不存在,或是所论不够深入,或是仅从某个角度研究某个流派,尤其是缺乏一种比较的视野。当然,笔者指出先行研究的问题点绝非刻意贬低前贤以抬高本书的价值,因为这些研究的课题及范围的设定本来就是基于某个视角的考量,只不过从本书的考察视阈和目标来看在先行研究之外尚有可申发、拓展的余地。无论如何,以往研究的真知